

創作簡論

楊 嘉



暨南大学中文系

1983

創作簡論

楊 嘉

暨南大学中文系编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文章千古事·····	1
创作方法泛论·····	14
艺术的生命贵在创新·····	35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	48
艺术民主与政治民主·····	61
人民生活——创作之源·····	79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92
作品的形象与思想·····	104
人物、性格及典型·····	111
情节与人物性格·····	119
无巧不成书·····	133
细节的真实性·····	140
矛盾冲突浅析·····	153
以情动人 以美感人·····	171
作品的艺术结构·····	185
语言艺术和艺术语言·····	198
想象·虚构·夸张·····	215
文学作品中的景物描写·····	236

鲁迅小说的写景状物.....246

论《北山记》的人物塑造.....255

源于生活与艺术构思.....269

情真·意深·识博.....277

后记

文章千古事

经国之大业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当时所说的文章，主要指诗赋、散文、评论之类的作品，这是我国早期在理论上把文学工作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提到同功业并重的地位，并认为可以流传不朽。古往今来，人亡物毁，灰飞烟灭，但往往却是人以文传，物因文显。例如秦始皇修建那瑰丽豪奢、回环耸迭的阿房宫，被楚项羽一把火烧成焦土，连废墟也湮灭无存。嗣后唐朝的杜牧写了一篇《阿房宫赋》，描绘殿址“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其中“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迥，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这才使我们在二千余年后的今天，得以依稀想象到当年皇宫的奇伟气势，慨叹古代帝王的暴敛极欲，也从中鉴照封建统治的得失及其罪愆。西汉司马迁惨受宫刑，他自惭“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所以忍辱而不死，就是立志要完成《史记》一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于是耗尽毕生心血，灌注其中，使这部鸿篇巨帙得以千古流传，不仅记叙了浩繁的史实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动态，教后人从中获取大量珍贵的历史知识；就文体而

论，也为后世写作史论、散文、传奇、小说等开创先风，提供范例。北宋范仲淹写的那篇《岳阳楼记》，不单使我们从那诗呈画现的景物中享受神游之乐，他在文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仍可供我们今天如何为人处世所师法。这些都说明优秀篇章的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影响，远远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无论在认识、教育、审美等方面都产生其积极的作用。真可说得是人生叹须臾，“文章千古事”（杜甫句）了。

古希腊有句名言：“艺术长久人生短”。俄国亦流传谚语：“用笔写下的东西，利斧也砍不掉”。列·托尔斯泰特地把这句话刻在他书房中的文具盒上，作为座右铭。他对创作态度的刻苦严谨，达到惊人的程度。巴尔扎克说过这样的话：“拿破仑用刀未能完成的事，我要用笔来完成。”他要用翰锋作为武器，取代刀剑，从不同的角度，刺向当时业已成为暴发户的资产阶级，剜出他们那贪婪卑鄙的灵魂。他孜孜不倦地写了九十多部作品，编纂成《人间喜剧》，真个象连珠炮弹一般，达到了“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恩格斯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切实而又形象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当年从守财奴演变成银行家的发迹史，嗅到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铜臭味。《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对于席勒年青时所写的剧本《强盗》，对那种抗逆的精神也曾作出这么评价：“他不仅完成了一桩文学事业，而且完成了一桩社会事业。”称赞他不仅是一位诗人，并且是一位战士。而英国人甚至宣称，莎士比亚是他们皇冠上的那颗金钢钻，宁可失掉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作家及其作品对于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如此巨大深远，这确是值得文学工作者认真深思和严肃考虑的问题，每当谋篇布局、下笔行文之际，必须提高自己的责任感，绝对马虎大意不得。清代学者顾炎武也曾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日知录》）。文章一旦发表，便会转化为精神力量，从思想、道德上影响读者，形成一种社会效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有益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历代文人对此亦曾兢兢业业，刻苦从事，“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很想抓紧时机留下传世之作。但究其动机和目的，大多数不外是把诗词文章视作个人的行当，借此抒怀、愤世、会友、求职罢了。况且文章千百万，有如大浪淘沙，唯有那些能够塑造美好形象，体现时代的脉搏，并具有真知灼见的优秀作品，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客观效果，经受甄别而流传下来。直至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者高尔基，他继《国际歌》作者鲍狄埃之后，自觉地把文学创作跟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如血脉相通，这就使文学事业从根本上起了变化，从此敞开了私人的胸怀，走出了狭隘的斗室，同人民群众和革命运动气息相关，休戚与共，赋予它光荣崇高的使命。他把作家的基本任务生动地比喻为“产婆”和“掘墓人”，认为革命作家应该同时担负这么两个角色：既要为无产阶级的创新事业催生，又要替颓败的资本主义制度送葬。他在极其丰富的创作实践中，既歌颂雄鹰、海燕，也嘲笑海鸥、企鹅；他的剧本有《小市民》、《底层》，也有《仇敌》；他创作长篇《母亲》，也写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等等；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散文、游记，尖锐地抨击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堕落。因

此列宁认为“高尔基同志用他的伟大的艺术作品把自己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得太牢固了”，赞誉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很多贡献。高尔基，率先在文学作品中弥漫着劳动者身上的油芳和汗味，播散出泥土的气息和机器的奏鸣，燃点起这支人类精神的火炬，既洞烛旧社会的幽微，也照亮新世界的通衢，将社会主义的文学沿着历史发展的阶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鲁迅对于文章的写作，也很重视新旧的两个方面，主张作家既要明白旧的，也要看到新的；应该了解过去，也能推断将来。他运用杂文作为利器，义无反顾地为反帝反封建投身于当年的现实斗争，同时以其敏锐的观察与渊博的学识，洞察先机，使人们受到教育和鼓舞，为后人所传诵。无论是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或者是经历十年浩劫后，于一九八〇年获奖的许多优秀短篇，如《三千万》、《灵与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无不是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社会生活的一定本质，运用文学的批判功能，同时蕴含着新的思想力量，与时代的气息相呼应，与群众的心声共奏鸣，因此为广大的读者所欢迎。这样的作品，才能充分显示其应有的艺术生命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文苑中成为不谢的香花。

鲁迅——中国的但丁

在中外历史上，每逢社会发生变革或转折，伟大的作家不仅以其杰作艺术地反映客观现实，并且往往作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卓越贡献，象架起了一座思想的桥梁，沟通时代的天堑，指引人们循着历史的通途踏往前去。恩格斯尝

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欧洲文艺复兴的序幕，就是由但丁拉开的。高尔基是俄国的但丁，用文学宣告一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海燕之歌》预示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即将来临，《母亲》则是射向俄国帝制的第一响枪声，也是奠定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块基石。至于我们中国的但丁呢？无疑要推鲁迅。周恩来同志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曾对鲁迅作出这样的评价：“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其实他就是这过渡时代的伟大桥梁。”郭老对鲁迅的评价则概括为：“从前有人歌颂孔子说：大哉孔子！孔子之前未有孔子，孔子之后亦无孔子。我们可以说：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未有鲁迅，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见《新文学史料》第二辑）鲁迅的一生，就象他自己所说的：“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包括我们在内，也是幸赖这位思想巨人，肩住了黑暗的封建闸门，好让我们跨过他那座

思想的“伟大桥梁”，走到这光明的时代中来的。鞠躬尽瘁，捐躯为人，大哉鲁迅！

鲁迅创作和翻译的作品，各有数百万字，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宗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这其中，既突出表现他那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呼喊出时代的最强音，记录了他同形形色色反动思潮作斗争的业绩，也寄托着他对新社会的憧憬与期望。所以他在1925年就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他特别强调文艺创作中的新精神、新思想：“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坟·论睁了眼》）他的最初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就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封建历史，每页上都涂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字里行间却满本都凝成两个字：“吃人”！他就是呼吁要彻底掀掉这“吃人的筵席”，并且执信：“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写于1936年10月17日），其中谈到，“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是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辮的自由”。反封建，争自由，这根思想红线贯串于鲁迅的终生。而时至今日，他这种生命不止，斗争不息的精神，对于我们仍然起着极大的鞭策作用。它形成了我国文学宇宙中的一颗恒星，发出熊熊不息的光和热，灼痛了各式论敌，给人们带来温暖与鼓舞。而在那无数永远辉耀着的光束中，最足以亮人眼目的，就是他那种义无反顾、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战斗精神。他认为，没有现在，也就没有将来。一九三二年正当国民党发动白色恐怖的文化围剿中，鲁迅就宣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现在的

战场，便正是为了无产者的未来而开拓的。他公开承认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他明确地提出，要先做“革命人”，才能写出“革命文学”。将近半个世纪前，鲁迅就把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与现实，创作与世界观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理论到实践，他都精辟地阐明，忠实地履行了。所以他始终能够与人民的苦乐相通，同时代的步伐前进，随革命的脉搏起伏。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更其重要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和高尔基一样，都是自觉地把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辩证统一在其作品之中，在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作家观察到的真实性，也同时体现着他的倾向性。唯其具备革命的思想，才能使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我国许多老一辈的作家，也继承了鲁迅的光荣传统，接过他那面彪炳的旗帜，为祖国的解放和革命事业奋战文坛。例如老舍，他仅在建国以后就一共写了二十三个剧本，既有《龙须沟》的歌颂，也有《茶馆》的回顾；既有《女店员》的赞扬，也有《西望长安》的针贬。其中一部《春华秋实》，曾十易其稿，手书达五十万字之多。他不愧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称号。又如周立波，他在土地改革时期，写了《暴风骤雨》；解放后转入社会主义建设，迅即创作《铁水奔流》；到农业合作化阶段，又完成了《山乡巨变》。他以卓越的文学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各个革命时期的现实，充分表现了一位作家对时代发展的深察卓见，确实做到了在文学战线上“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也可称得上有了中国的但丁，

中国的高尔基；但数人论作，的确还没有形成星云河汉，璀璨闪耀于世界文坛。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指出：“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不是没有，而是太少。这无疑是党对文艺工作者的鞭策和勸勉，也是人民的殷切期望。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新起点，这也正是人才辈出，俊彦群涌的时代。郭老当年对“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的预祝，可以寄厚望于我们新的一代中得以实现。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做到如鲁迅所说的，先做革命人，才能写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文学。

勤奋出天才

恩格斯在那篇序言中还同时提出这样的期望：“意大利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把这无产阶级新时代的诞生描绘出来呢？”基于历史条件所限，这个问题只得由高尔基作出了令人满意的明确答案。至于鲁迅，他不幸而瞑目于我国无产阶级新时代的诞生之前。因此，描绘我们这个新时代新人物的光荣职责，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当代其他文学家的肩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作家，除了必须树立正确的政治思想，具备丰富的生活积累，激发充沛的创作热情之外，还应该重视艺术技巧，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把纷繁复杂的生活斗争表现出来，诉诸形象，成为精心独创之作。要有“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毅力，勤奋探索，反复锤炼，不惮修改，敢于创新。外国有句谚语：“书是熬出来的”，是用自己的心血浇培起来的。虽然勤奋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作家，但作家则必须勤奋，真个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孜孜矻矻的发愤精

神，才能有所作为。

在这方面，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作家的先例，大可供我们揣摩、参考。屈原放逐，发愤忧思，遂赋离骚。刘彦和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镗毫。”不如是，不足以流传千古。东汉的著名天文学家张衡，二十九岁那年，写了《东京赋》和《西京赋》，描写洛阳和长安的豪华气象与贵族的奢糜生活，共花了十年功夫，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贯串于他后来的科学研究之中。曹雪芹写《红楼梦》，自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晚年贫困潦倒，死于旧岁除夕，当晚酒后还萦念着过了年要把写好的八十回手稿收回来，再加修订。这真是梦回魂绕，仍铭刻于心。我国古代作家有个好传统，就是“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精心推敲，务必做到“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所谓“书痴文必工，艺痴技必良”，熟能生巧。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劳动，无质量便无数量可言，反之便会谬种流传，徒然害人败事，故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郭老在其致友人的书简中曾说：“我向来主张：多写作，多修改，少发表。这于我们的进修上很有用处。最好我们要养成一个下笔谨严，不苟且、不草率的习惯。”（《文艺报》1979年第五期）郭老是无产阶级的一代杰出作家，博古通今，高才壮采，而落笔严谨，虚怀兼听，律己不弛，实足为我辈景仰、

有一部纪录影片《列夫·托尔斯泰手稿》，摄制了保存他的大量手稿，通过那些亲笔遗墨，说明他长年坚持艰辛劳动的创作事迹。其中有一篇论文，曾经修改了几十次。他在《复活》描绘那位女主角玛丝洛娃上场，从容貌、眼神、形

态到衣饰，修改了二十次才算定稿。据说只要把誊清的样稿送到他面前，就没有不再动笔厘正的，真是锲而不舍，一丝不苟。他在答复安特列夫的信中曾谈到三点意见：一，千万不要为了金钱而写作；二，不是深深感动了你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写；三，你如果有意写一本书，而你也可以不写的话，那末还是不要写。这种要求多么严格而又正确，应当成为文学工作者的座右铭。至于巴尔扎克的创作劳动，更是惊人。他在通信中曾诉说：“我每天写作十五个小时，天一亮就起床，一直写到吃午饭，只喝一杯浓咖啡。”他路遇友人，也不愿闲谈，俾可节省时间，争分夺秒。以巴尔扎克之勤，他创作的长篇《幻灭》，前后共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以雨果之博，他于一八四五年动笔写作《悲惨世界》，至一八六二年流亡盖尔勒赛岛时完成，历经十七载。众所周知，歌德创作那部著名的诗剧《浮士德》，延续了六十个春秋，作品的完成也是作者接近人生的终结。另一位法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四十年如一日，著作将近一百部。他去世后，在书房发现其亲手摘录的笔记本子达二万五千多册。为了写《月球探险记》一书，他细心阅读研究过五百多本的图书和有关资料。这真是多么艰巨的劳动创造！劳动出天才，勤奋出巨匠。这些语言艺术大师所以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举世叹服，并不是靠闭户冥思，离群幽索得来的，而是在浩瀚的生活海洋中深入泅游，在渊博的知识基础上苦心造诣，在实践的峭崖峻岭上勇于攀登，才得以把文学的业绩推向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不妨重温高尔基的这句名言：“天才就是劳动。人的天赋就象火花，它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逼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再劳

动。”我国的鲁迅、郭老、茅盾等文学先辈，他们发表的文字都以千万计。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探索前人的宝贵经验，按照思想水平与生活条件，在创作中灌注新的血液和生命。这样，才有可能达到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提出的要求：“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

香自苦寒来

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重申：“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他要求文学艺术家在创作的题材、形式、风格上必须丰富多样，繁花竞放，“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党的正确指引，必将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使文艺工作者在艺坛上有自由施展的辽阔天地，“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党在决定了方针、策略、计划之后，放手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大力鼓励个人在艺术上的独创性，而不必采取行政命令，不要横加干涉，扼杀生机。这是对领导方面来说的，也是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强调的精神。但对于作者来说，除了必须具备正确观点，生活积累，文化修养，艺术技巧之外，谦虚的态度也是必要的。自大与愚昧，刚愎与颟顸，往往是孪生的兄弟。文学创作主要是个人的精神劳动，由于这种偏重独立思考的形象思维方式，同时每一位作

者都总是选择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想把自己认为最美好的故事、人物、语言等等倾注到作品中去的，因此也容易产生一种自以为是，自我陶醉的心理，这在热情而又年青的作者身上尤易流露。“文章自己的好”，往往自视为握珠抱玉之辈，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常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无疑是旧社会的恶习，但在新社会也一时未能把这种思想毒菌根绝。因此，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这类古语，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也还是有用的。郭老写成《屈原》后，再推敲台词，就曾听取别人的意见，有过“一字之师”的美谈。周总理对电影《达吉和他的父亲》跟别人有不同的看法，彼此以平等探讨的态度，各自保持一家之言，并不以势压人，容许对方有思索咀嚼的余地。陈毅同志是一位写诗的杰才，他虚心地把作品送请毛主席批改。而毛泽东同志却谦诚地说，对于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并推崇“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我们要认真学习革命先辈的这种精神和美德。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但最主要的，还是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断汲取丰富的创作营养，永葆艺术生命的青春。能把自己的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这是最光荣不过的事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是至理名言。因此在濡翰搦笔的过程，就要时刻高度自觉地对人民、对社会负起这个严肃而又崇高的职责。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民服务”。这就正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

而草率从事，急于名利，则是难以做到的。邓小平同志转借马克思的引语，用以勉励我们：“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这应该成为我们时刻铭记的箴言。